

中國靈魂爭奪戰

習近平治下的宗教復興、壓制和抵抗



目錄

概述	1
總論	4
變化中的宗教控制和迫害機制	15
圖表：關鍵的宗教控制手段	24
地圖：各省宗教迫害情況	25
I. 漢傳佛教和道教	26
II. 基督教	42
III. 伊斯蘭教	66
IV. 藏傳佛教	86
V. 法輪功	108
建議	130

關於作者

薩拉·庫克是自由之家資深東亞研究分析員，為本項目主任以及報告作者。她主持《中國媒體快報》，每月一期，以中英文兩種語言提供有關中國新聞和言論自由方面的新聞和分析。她還是兩份自由之家特別報告的作者：《政治局的困境：中國共產黨壓制政策的局限性》（2015年），以及《中國審查制度的陰影：中共媒體管制如何影響全球新聞媒體》（2013年）。

研究、編輯和顧問團隊

五名精通中國宗教群體的專家（三名博士候選人、一名獨立研究員、和一名記者）為本報告的五個章節提供了研究支持，但他們希望保持匿名。Tyler Roylance (自由之家編輯), Annie Boyajian (自由之家倡議負責人), 以及實習生Bochen Han 與 Cathy Zhang 提供了編輯和研究協助。三名希望匿名的中國研究學者擔任了學術顧問。

致謝

本報告因為得到了Lynde and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 的慷慨支持才有可能完成。特別感謝Arch Puddington, Daniel Calingaert, 和 Robert Ruby提供意見和反饋。Garry Fey 擔綱圖像設計師。

封面說明

在2016年2月藏歷新年期間，大量中國軍人在甘肅省色達喇榮寺五明佛學院外聚集，防止抗爭爆發。(Christophe Boisvieux/Getty Images)。

IV: 藏傳佛教

迫害嚴重程度：

藏傳佛教

非常高

迫害變動趨勢：

藏傳佛教



略有增加

主要調查發現

- 1 復興與發展：**在“文革”的殘暴破壞之後，藏傳佛教有了顯著復興。在過去十年，它在中國各地的城市漢族精英中贏得了數百萬新信徒，這些人與大約600萬藏族人一起加入了這個傳播廣泛的宗教信仰。
- 2 嚴密管控：**中國當局對藏傳佛教信徒的宗教活動施行嚴厲控制，尤其當其事關對流亡的達賴喇嘛的虔信——這是很多信徒的核心原則。官方人員派駐寺院、無處不在的監控、例行的“再教育”運動、對旅行和通訊的限制、限制政府工作人員和大學生宗教信仰的各種規章制度，對絕大多數寺院僧眾和很多世俗信眾都產生了影響。不過，針對不同的地理區域和不同藏傳佛教派別，管控措施的落實程度有所不同。
- 3 武力打壓：**在藏族地區，中國安全部隊會快速採取強制措施鎮壓他們認定的宗教不同意見，包括對手無寸鐵的平民使用真槍實彈。人權團體和媒體的報導顯示，自2012年11月以來，至少有321名藏人因涉及宗教行動或意見表達而遭到拘禁，其中75人被判處徒刑。³ 每年都有若干人在被警方拘押期間喪生。⁴
- 4 在習近平統治下的藏傳佛教：**習近平主席基本上延續了胡錦濤時代的政策和打壓運動，並且深化和擴大了某些管控措施。一些新的管控措施增強了政府與僧俗信眾之間的緊張關係。其中包括，對協助自焚者判罪，取消過去允許的節日活動，加強對私人宗教活動的粗暴限制，採取更加主動的措施篡改藏傳佛教教義和操縱宗教領袖的傳承。
- 5 經濟的胡蘿蔔和大棒：**政府採取各種不同的獎懲措施，鼓勵地方官員使用強制性而非合作性的方法來處理與藏傳佛教界的糾紛。經濟手段也逐漸地被用來作為一種集體處罰方式，用以嚇阻抗議行動或對宗教打壓的反抗。這種措施常常會影響整個家庭或村莊的生計。



2016年，在強拆前和強拆中的著名色達五明佛學院。據報中國當局試圖降低來此學習的藏人和漢人的人數。

圖片來源：維基媒體 / Jimmy Lee, Contact 雜誌

6 韌性與抗爭：儘管遭受了超過20年的鎮壓，事實證明藏人私下對達賴喇嘛的虔信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韌性。中國官員和媒體對達賴喇嘛持續不斷地斥責和污蔑，是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中，最令藏人反感的部分之一。強迫僧俗信眾詆毀達賴喇嘛的運動的擴大，一直是挑起抗議的關鍵因素，其中包括2009年以來的（超過）140起自焚抗議事件。也有很多藏人採取較為細緻的抗爭方式，創造一些不引人注目的方式進行受到禁止的宗教活動或分享資訊。



“共產黨才是老百姓真正的活菩薩。”

—張慶黎，前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2007年3月¹

“政府的宣傳是沒用的，人人都知道這些是假的。（達賴喇嘛）尊者就是所有藏人的一切。在西藏，所有人都希望有一天能見到尊者。”

—尼瑪拉姆，最近來自四川的流亡難民，2016年8月²

藏傳佛教在當今中國

若干世紀以來，藏傳佛教和它遍佈各地的僧尼寺院網路，一直是藏區經濟、社會、政治和宗教生活的中心，這個地區很多宗教場所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7世紀。自17世紀中期的第五世達賴喇嘛開始統治整個西藏高原以來，政治與宗教權威尤其密切相關。

藏傳佛教獨特的宗教傳統——它的宗教經典、舞蹈、密宗修行以及作為寺院教育中心部分的哲學辯論——都與在中國其他地區被廣泛接受的大乘佛教有著顯著的區別。一般的宗教活動通常包括在寺院中進行供養、念頌祈禱文、在家中設立佛堂、慶祝一年一度的各種節日、完成在拉薩和高原其他地區各處聖地的朝拜等。⁵ 這些活動在中國的藏區相當普遍常見。不過，同樣常見的是大批部署在一些主要寺院周圍的重裝武警和員警，以及安裝在宗教場所內部和周邊的監視攝像頭。

過去10年，限制措施在絕大部分藏區都有所加強，，但是執法力度在不同的寺院和一般信眾群中有所不同。

根據官方統計數字，截至2014年在全國各地共有3600座有宗教活動的藏傳佛教寺院或廟宇，有14.8萬名藏傳佛教僧尼，遠遠超出漢傳佛教僧眾的統計數字，顯示出宗教制度在藏人中所佔據的特殊重要地。⁶ 據稱，其中有1787個宗教場所和超過4.6萬名僧尼位於西藏自治區境內。⁷ 儘管無法獲得信眾的確切數字，一般認為除非是擔任中共黨員或是政府官員，生活在中國的628萬藏人絕大多數都會參與某種形式的藏傳佛教活動。⁸

除了公共視野中民眾的虔誠和政府的管控之外，還有一系列針對僧俗信眾宗教活動的幕後限制措施，嚴厲的——有時是致命的——鎮壓行動通常由安全部隊執行。過去10年，限制措施在絕大部分藏區都有所加強，但是執法力度在不同的寺院和一般信眾群中有所不同，而且也隨不同的特殊時間點有所波動。有若干原因導致了這些差異：

- **地理位置：**相比於其他省份的藏區，西藏自治區的情況明顯更加惡劣，儘管這種差異近年來逐漸縮小。在四川、青海和甘肅的那些有主要寺院的地區管控似乎更加嚴厲，而在其他更加邊遠的地區以及雲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迪慶）則比較寬鬆。⁹ 因而，有些村莊一輪接一輪地接受“愛國主義再教育”——其中就包括了強制攻討達賴喇嘛，而另外一些地區則基本上可以倖免於此。¹⁰ 藏傳佛教的那些來自中國的漢族追隨者們通常實踐的是一種混合版本的信仰，結合了一些來自漢傳佛教傳統的因素。他們的宗教實踐或許不包括對達賴喇嘛的崇拜，這就意味著他們會面臨比較少的官方制約。
- **地方官員的態度：**儘管有來自中共中央的強硬政策，地方官員在管制他們自己的轄區方面還是有一定的靈活性。在少數藏族自治州，某些尤其本身是藏族的官員對宗教活動較為瞭解，並和當地寺院保持著一種更具合作性的關係。除非受到中央當局的壓力或是被迫處理一些備受關注的抗議事件，他們較少採用敵對性的措施，對一些違反政策的行為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¹¹ 甚至在西藏自治區境內，在不同時期、不同的黨委書記領導下，打壓的程度也存在明顯差異。¹²
- **不同的藏傳佛教派別：**達賴喇嘛領導藏傳佛教最大的派別格魯派，不過信奉其他派別的藏人同樣尊崇達賴喇嘛。很多宗教限制措施同樣施加在屬於寧瑪派和噶瑪噶舉派的寺院和信眾身上。儘管如此，尤其在與地方官員的關係上，那些來自非格魯派的高僧們似乎較易抵擋一些官方的限制性措施。同時，雄天（Shugden，藏傳佛教中的一位神靈）信仰者與達賴喇嘛有著歷史恩怨。近年來，中國當局試圖利用他們之間的內部分歧，給雄天派寺院和宗教領袖提供資金和其他支援，甚至鼓勵格魯派寺院的僧人崇拜雄天。¹³
- **寺院規模：**寺院規模大小懸殊，小到只能容納10到20名僧尼，大到如同一座城市，有數千

人居住其中。大型寺院更易於吸引政府注意力和產生政治異議，進而導致受到安全部門的鎮壓和干預性管控。

- **敏感日期和事件：**安全部隊的部署、通訊管制的實施以及對大型集會的限制，事實上都未必是永久性的。相反地，當局經常是在一些政治敏感日期之前採取這些措施——比如3月份的西藏起義周年紀念日或是7月份的達賴喇嘛生日等等——或者是為了回應某些事件，比如自焚或是在某個集市上發生的小型抗議。

由於當局擴大了干預性限制措施、“愛國主義再教育運動”以及加強對西藏自治區以外更多地區和較小寺院的監控，上述在管控措施方面的種種差異，近年來已經逐漸消失。

藏人中的藏傳佛教信徒人數大體保持穩定，而在過去十年有關藏傳佛教的一個顯著的變化是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漢族追隨者，尤其是一些城市精英。據信有數百萬人皈依了藏傳佛。¹⁴ 一些觀察人士把藏傳佛教，而非漢傳佛教，在漢族人當中越來越受歡迎歸因於藏傳佛教的僧侶們能夠直接地為信眾們提供更加廣泛的精神引領，以及很多漢族信徒對獲得超自然能力的興趣。¹⁵

這種變化對藏區的宗教活動兼有正負兩面的影響。一方面，擁有大量漢族信徒的藏傳佛教寺院或廟宇有更好的管道獲得捐贈和來自非政府管道的資金，以及在北京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這些漢族支持者或許能夠在危機時刻進行某種干預，緩和鎮壓行動並且促使地方官員和寺院領袖通過協商解決衝突。¹⁶

另一方面，漢族信徒的增加也許會引發新的政府干涉。例如，中國政府在2016年1月發佈的政府認可的轉世活佛資料庫，一些專家解讀，因為這樣的宣告對於藏人信徒幾乎沒有什麼正當性可言，當局此舉主要是力圖誘導越來越多的藏傳佛教的漢族信徒。¹⁷ 一位學者也把自2016年夏天開始的對喇榮佛學院的一系列強拆行動，歸因於政府擔心其在漢族信徒中的影響力，據報導，有至少1萬名學員在那裡完成了學習，這個佛學院的一位資深宗教領袖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平臺上累計有超過200萬追隨者。¹⁸

中共政策的起起伏伏

在1950年，中共軍隊入侵藏區，並且輕鬆擊敗了藏軍。第二年，這個地區正式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兼併。最初，中共領導的政府試圖與西藏政教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建立起一種合作性的關係，但是這種關係很快土崩瓦解。¹⁹ 1959年，中國軍隊鎮壓了在拉薩發生的大規模起義，據稱有上萬人被屠殺。達賴喇嘛被迫帶領大約10萬名支持者逃亡印度。²⁰

1965年，大部分西藏領土被納入西藏自治區，而西藏高原的東部地區則被作為藏族自治州併入相鄰的各個中國省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期間，西藏地區幾乎所有的寺院都被關閉或摧毀。成千上萬的僧尼被迫脫下袈裟還俗，任何表達宗教信仰的行為都受到嚴格禁止和嚴厲懲罰。²¹

漢族信徒的增加也許會引發新的政府干涉。

在1980年開始的改革時期，政府重新允許有限度的宗教活動，寺院的重建也逐步開始。恢復的規模和步伐很快引起了黨的領導人的警覺，並在1980年代後期試圖對寺院施加一些干預性管控措施。在1987至1989年之間，這些管控和其他一些不滿情緒引發了在拉薩和周邊地區近200起大體上是和平的抗議示威。隨著反政府抗議在1989年3月升級，政府在拉薩實行戒嚴，持續到1990年5月。當時西藏自治區的黨委書記胡錦濤，後來在2003至2012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1990年代的政策特點是，中共穩步提高了對藏傳佛教的管控措施並努力削弱流亡的達賴喇嘛的影響力。在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上，中共領導人將達賴喇嘛認定為敵人，這是一個關

鍵性的轉變。中國國家媒體隨即開展對達賴喇嘛的中傷詆毀，對擁有達賴喇嘛畫像和崇拜達賴喇嘛的禁令也很快見諸報導，不過當時這些禁令的法律基礎依然不明確，執行程度也因人因地而異。²² 在隨後幾年，中共統戰部在各個寺院開展了各種“愛國主義再教育”運動。這些強制性的“學習班”例行地要求僧尼對達賴喇嘛進行口頭和書面的聲討。²³

到2000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區內的各種限制措施已經相當嚴格，而周邊省份仍然相對寬鬆，藏人依然可以在各省區之間旅行以及獲准出國。僅在2007年，就有數千藏人利用各種機會去拉薩甚至去印度旅行，進行朝拜或聆聽講經說法。²⁴ 從2005年左右開始，中國當局開始擴大“愛國主義再教育”和其他強悍的措施，以期降低達賴喇嘛在西藏自治區以外藏區的影響力。

學者們認為，這些管控措施的擴張是導致2008年3月10日拉薩動盪的關鍵因素，當時來自拉薩哲蚌寺的僧人領導了一場1959年起義周年紀念遊行。²⁵ 在安全機關鎮壓了僧人們的抗議之後，騷亂爆發了。一些藏人襲擊漢族居民並焚燒了漢族和回族人擁有的商鋪以及政府辦公場所。很快地，在西藏自治區和其他省份的藏人聚居地區爆發了超過150起大體上是和平的抗議活動。

政府最初的猶豫，明顯是為了避免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前的僅僅幾個月時間引發一場引起世人關注的衝突，但其最終決定部署大量武裝部隊作為回應。在至少四起事件中，安全部隊向抗議者開槍。²⁶ 中國有關當局報導說在拉薩有19人喪生，主要是死於火災。²⁷ 而海外藏人團體則聲稱有至少100名藏人在安全部隊鎮壓抗議示威的過程中，遭到殺害。²⁸ 在最初的鎮壓行動之後，各個寺院被安全部隊重兵嚴控長達數月，同時有數百名涉嫌參與抗議或向海外提供消息的僧俗藏人遭到逮捕和監禁。²⁹

據說，很多官員對西藏高原各地發生的眾多大規模藏人抗議事件感到震驚，因為很多人覺得過去9年裡都沒有發生大規模抗議示威，意味著藏人已經接受了中國的統治並且降低了對達賴喇嘛的虔信。³⁰ 事件後中共領導人重新檢視了他們的對藏政策，但其非但沒有放鬆那些引發不滿情緒的限制政策，反而是強化它們。很多接受本報告採訪的僧人和學者一再指出，2008年是政府管理藏傳佛教政策的一個轉捩點。至今，藏區遭遇了更嚴格的旅行限制、更密集的政治教育運動，以及在宗教慶典活動和寺院周圍部署更為強化的安全力量。³¹

習近平統治下的藏傳佛教

習近平於2012年11月執掌中共之後，他繼承的是一個形勢殊為緊張的西藏高原。一系列自2009年開始的自焚抗議事件在那時達到頂峰。³² 據報導，由於西藏的文化空間長期遭受侵蝕，以及藏人2008年後在宗教信仰、旅行、兒童教育和日常生活受到的日益嚴厲的限制，他們深感憤恨和無助，這些經歷和感受因而促使他們採取如此決絕的抗議行動。³³ 僅在2012年11月，人權組織報導了28起自焚事件，表明有些藏人至少希望吸引習近平的關注，並希望他能採取較為懷柔的政策。³⁴

在2013年上半年，有那麼一個短暫而罕有的政治機遇，一批研究西藏問題的中國學者發表了數篇文章，呼籲在西藏地區採取更加寬容的政策。一位來自中央黨校的專家建議不要再將達賴喇嘛看做敵人，甚至應該允許他作為“宗教領袖”訪問香港。³⁵ 有觀察人士認為，曾擔任胡錦濤副手和統戰部部長的令計畫³⁶在推行對藏強硬政策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而其在2015年1月被捕或許會為比較“懷柔”的對藏政策創造一些空間。³⁷

這種樂觀態度估計迄今未見任何成效。習近平尚未恢復與達賴喇嘛代表的會談；上一次為人所知的會談還是在2010年。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當局基本上延續了胡錦濤時代採用的手法，包括對

“發揚藏傳佛教界愛國愛教傳統…支持藏傳佛教按照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要求進行教規教義闡釋”。

— 習近平，2015

宗教自由和人權的更加明目張膽的大規模嚴厲侵犯，有時甚至還導致了人員傷亡。

在2015年期間，中共的對藏政策似乎成為官方的優先議程，其召開了一系列高層會議。4月，中國政府發表了一份有關這個地區的白皮書，³⁸ 8月中共召開了由習近平親自主持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國家媒體對於這兩個事件的報導顯示，中國政府打算保持強硬姿態，同時加強教育運動。官方聲明明確拒絕了達賴喇嘛有關西藏在中國之內實現真正自治的“中間道路”提議，並斷言中共將選擇下一世達賴喇嘛。尤為重要的是，在7月份召開的一個高層戰略論壇將焦點放在如何協調西藏自治區和周邊省份藏區的“維穩”措施，這個能意味著將來對周邊藏區也會採取更加嚴厲的控制手段。³⁹

儘管政策在總體上是延續的，不過有關當局還是對若干現行限制措施的範圍進行了深化和擴大。下面援引的各種措施——包括處理自焚案件的指導方針和篡改藏傳佛教教義的計畫——都是直接由中央當局推動發起的。在2015年8月召開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宣稱要“發揚藏傳佛教界愛國愛教傳統…支持藏傳佛教按照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要求進行教規教義闡釋”。⁴⁰ 還有其他一些措施則似乎是由其他較低階的政府當局主動發起。

1. 以“連坐”阻止自焚：自2012年底開始，一些地區的官員採用諸如取消自焚者家庭的公共福利或者停止自焚者村裡的國家資助項目。⁴¹ 2012年12月份，中央的司法和公安機關公佈了指導方針，要求將所有參與自焚以及與此相關的組織、協助、聚眾行為都視作刑事犯罪，在部分案例甚至可以被視作故意殺人。⁴² 2013年，政府開始實施這項政策，抓捕自焚者的親友並判以長期徒刑。
2. 頻頻禁止節日慶典：儘管有些宗教慶典過去就被禁止，比如達賴喇嘛的生日，但是自2012年以來地方當局限制了更大範圍的慶典活動。2014年5月，政府對試圖前往崗仁波切峰（Mount Kailash）的人下達了旅行禁令，這座山峰是藏傳佛教一處重要的朝聖地。隨後在6月份，（那曲地區）比如縣的一項地方規定嚴厲禁止藏傳佛教信徒前往參加一個大型法會（指2014年7月達賴喇嘛在印度北部拉達克地區舉辦的時輪灌頂法會——譯者注），這是藏傳佛教信徒們最重要的宗教儀式之一。⁴³ 一些非宗教性的活動，像2015年6月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瑪曲縣——譯者注）的賽馬會，也因為間接表達了對達賴喇嘛的崇敬而被取消。⁴⁴ 即便有些節日活動得到許可，也經常會伴隨有大量武警部署，破壞寧靜祥和的氣氛，在這種情況下甚至一些微不足道的摩擦也會迅速升級為致命衝突。⁴⁵
3. 加強處罰一般信徒的宗教活動：雖說全國各地的中共黨員都必須是無神論者，但西藏地區包括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員、學生和教師，都被禁止或積極阻止參加那些其他人通常被允許的藏傳佛教日常的宗教活動，包括去寺院進行供養和在家中私自設立佛堂等等。⁴⁶ 2015年期間，在一項明顯是為了強化這些禁令的行動中，西藏自治區當局對中共幹部和公務員當中的違紀行為進行了處罰。根據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在一次媒體採訪中所說，這項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是針對那些“對宗教明裡不信暗裡信”的人。⁴⁷ 另外，在2015年初，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的幹部們傳閱了一份文件，其中列舉了各種可能受到嚴懲的活動，因為這些活動被解讀為支持西藏獨立；像念頌禱文和燒香這樣普通的宗教活動也被名列其中。⁴⁸
4. 篡改教理教義：一個在胡錦濤時代提出的方案在習近平當政後變得來勢洶洶，這項方案旨在篡改藏傳佛教的教理教義，使之能更好的適應“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⁴⁹ 約翰·鮑爾斯（John Powers）教授在他2016年出版的《黨即是佛》（Buddha Party，暫譯）一書中詳述了這個方案。該方案在各項內容當中包括了，自2012年起舉辦藏學會議，以確定藏傳佛教的教義中哪些是對黨有利的，並且每年出版類似於《藏傳佛教教義闡釋》（2011年出版）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據稱是各個寺院的指定閱

讀，而且已經成為“愛國主義再教育”課程的核心內容。

一個同時出現的事態發展是，2011年10月在拉薩開辦了一所新的政府支持的“西藏佛學院”，它的第一屆畢業班已於2013年完成培訓；該佛學院所屬的“尼姑部”也正在建設。⁵⁰ 一位學者認為官方的這些努力與2016年開始的對喇榮五明佛學院的強拆存在某種關聯，此前若干年政府對喇榮五明佛學院一直比較寬容。⁵¹ 最近一些年，這個佛學院的各寺院領袖在推廣一項倫理層面的“佛教改革運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這一運動已經贏得成千上萬的藏人追隨者，因而可能被當局看做是官方自身試圖改變藏傳佛教信仰內容的競爭對手。⁵²

有眾多原因可以解釋為何中國領導人一直在尋求用強硬手段解決問題，就算這些手段明顯地增強了不滿情緒，而且在遏制達賴喇嘛的影響力方面收效甚微。

首先，中共對宗教尤其是藏傳佛教內在的焦慮依然未變。正如學者本·希爾曼（Ben Hillman）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書中所注意到的，“有組織的藏傳佛教一直被廣泛地認為是對共產黨在西藏地區統治的最大的潛在威脅。”⁵³

第二，這些政策反映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假設，即宗教信仰——以及與宗教相關的民族認同——將會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逐步消亡。中國領導人依然對他們以現有工具實現這個長期目標的能力，保有自信，即便過程中有偶爾的動盪挫折。⁵⁴

第三，領導人的個人作用。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於2011年8月上任，直至2016年8月離任。自上任伊始，他就開始實施若干專案，旨在對民眾進行監控和在僧俗信眾當中灌輸中共的信條。對於西藏的這個地區而言，地區領導人的變動似乎要比一年後北京更全面的權力交接對政府的日常行為影響更大。

第四，雖然令計畫遭到清算，但“統戰部”依然是中共的一個實權部門，也是在藏區實行諸如“愛國主義再教育”這樣的“管控與拉攏”策略的主要推手。統戰部目前的上級主管是政治局常委俞正聲，他也是政治局下屬的“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組長。

旅行限制和大量的監控措施已經給很多藏人的宗教活動造成了一種令人窒息和恐懼的氛圍。

最後，有關官員提拔和對西藏地區的中央集權式的資金分配等結構性因素，也促使地方官員將精力集中在短期的經濟增長和打壓社會動盪，而不是去解決社會需要以及與宗教人士建立合作性的關係。同時，給地方政府輸送的數十億元“維穩”經費也刺激了安全機構的擴張，使安全部門有持續其打壓行動的機構性利益。⁵⁵

主要政治管控手段

中國政府對西藏的僧俗信眾實施了範圍廣泛的管控措施。這些措施日益侵入和蠶食到一些原本不受騷擾的生活領域。旅行限制和大量的監控措施——通過安全部隊、線人、閉路電視、互聯網和手機監控，甚至包括無人飛機⁵⁶——已經給很多藏人的宗教活動造成了一種令人窒息和恐懼的氛圍。在公共場所和寺院裡隨處可見的宣傳標語和口號，時時提醒僧俗民眾官方的各種宗教管理規定，要求人們將對國家的忠誠放在首要位置，以及告知違反規定——比如攜帶念珠或其他宗教物品進入政府大樓或學校——將會遭受的懲罰。⁵⁷

所有這些措施，再加上以下列舉的這些主要管控措施，似乎都是服務於中共旨在管理藏傳佛教的一些目標：

- 削弱寺院與周圍社區之間的聯繫。
- 切斷民眾與達賴喇嘛和其他流亡宗教領袖們之間的紐帶。
- 提高政治上忠誠的宗教領袖和有利於政府的教義闡釋的影響力，其中最顯著的就是政府指定的班禪喇嘛。
- 在藏人當中培養宗教認同度較低的社會經濟精英。
- 限制寺院社群的規模和寺院教育的品質。
- 阻止因宗教信仰或對達賴喇嘛的虔信而引發的抗議。

1. **管控宗教領導人，包括轉世活佛：**政府及其附屬機構，如中國佛教協會，不遺餘力地掌控對宗教領袖的任命，並利用他們來向其信眾傳達政府立場。就藏傳佛教而言，由於轉世系統在最高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或班禪喇嘛）和高僧（如一些主要寺院的住持）選擇方面的重要作用，所以這項任務尤為棘手——甚至有些荒誕。作為明確表示自己是無神論和拒絕相信靈魂轉世的中共，堅持要把對自己的政治忠誠作為前提條件來管理轉世靈童的選擇過程和最終結果的認可。

2007年，國家宗教事務局頒發了一份文件，名為《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聲稱活佛轉世必須得到國家批。⁵⁸ 2016年1月，有關當局發佈了一個新的官方認可的轉世活佛（朱古）的網上資料庫，引人注目的是達賴喇嘛被排除在這個資料庫之外。近年來，那些試圖對他們的未來轉世提供指導或是徵求達賴喇嘛意見的寺院領袖，或是遭到拘捕、驅逐，或是被禁止與他們寺院的僧人繼續進行交流。⁵⁹

按照2015年8月發佈的官方統計，有超過7千名官員在西藏自治區的1787座寺院裡工作。

2. **對僧尼寺院實施大規模管控：**有一長串政府規章條例影響著寺院的生活，其中包括各個寺院許可的人數限額，有關在寺院內和周邊社區舉行宗教活動必須獲得官方批准的規定，以及要求詳細記錄寺院財務狀況和每月彙報“愛國主義再教育”的進展。⁶⁰

通過攝像頭或是在寺院中實際部署警力進行的大規模監控，從而威逼僧人就範，同時也提供途徑來識別政策落實中的漏洞。對拒絕服從者的處罰包括從逐出寺院、開除僧籍、逮捕入獄直至徹底關閉寺院。過去，官方工作小組進駐寺院，儘管有時會長達數月，但仍僅是臨時性措施，並且，寺院日常的管理委員會還是由政治上可靠的僧尼領導。如今，在寺院永久性派駐政府官員的管控模式自2011年8月起逐步擴大，並通過2012年1月發佈的管理規定而得以正規化。⁶¹ 按照2015年8月發佈的官方統計，有超過7千名官員在西藏自治區的1787座寺院裡工作，平均每座寺院四名。⁶²

3. **“愛國主義再教育”運動擴大化：**自1990年代起，就斷斷續續有意識形態教育運動，但是從2008年以後，此類運動變得更加頻繁和漫長。而且已經逐漸超出寺院的範圍而向藏區一般民眾延伸，如強迫學生、公務員、農民和商人參加學習討論、唱紅歌、及看宣傳電影。

從2011年開始，據報導有超過2.1萬名幹部被派往西藏自治區各地鄉村。除了政治監控和其他任務，據稱他們還要在宗教場所和信眾當中舉辦“愛國主義再教育”學習。⁶³ 這樣的學習活動通常會要求譴責達賴喇嘛，承認政府選定的班禪喇嘛以及宣誓效忠於中共的政治權威。“愛國主義再教育”運動向西藏自治區以外的更多寺院和一般民眾的擴張是一個與以往不同的變化，而且據稱在很多藏人中引起反感。

儘管達賴喇嘛准許藏區的信眾們可以在遭受逼迫時對他進行譴責，因為這事關自我保護，但是很多忠誠的信徒依然對這種做法感到難受。⁶⁴ 那些屈從的人指出他們因此所遭受的心理摧殘而最終中斷他們在寺院的長期研習。⁶⁵

4. 在藏區內外限制旅行：在過去十年，藏人出國變得越來越難，無論是尋求庇護或是去印度或其他國家的短暫訪問。進入尼泊爾的難民人數從2007年的超過2000人銳減到2014年的大約100人。2015年人權觀察的一份報告顯示，藏人常常被拒發護照或是在從印度旅行返回之後受到訊問。⁶⁶ 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對這些限制措施的效果感到驕傲，他在一次媒體採訪中聲稱，“在2015年，西藏自治區無一人參加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印度舉辦的法會。”⁶⁷

在藏區，僧尼出國旅行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近期的遊客還提到了一項自2012年起執行的非正式禁令，限制任何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人訪問這個地區，包括那些前往朝聖的人。⁶⁸ 學者們也注意到越來越嚴格的旅行限制，尤其是藏人再也無法逃出境外，更加劇了他們的絕望情緒，進而激發了自焚等極端行為的出現。⁶⁹

5. 加強資訊控制：局部地區的互聯網和手機通訊封鎖——尤其在那些出現自焚事件的地區——時有發生，而且自2012年初以來愈加頻繁，並持續到2016年。⁷⁰ 2016年，人權觀察的一份報告分析了自2013年至2015年479起藏人因政治原因而被拘押的案件，確認其中有71人是由於傳播圖片或資訊而遭逮捕。⁷¹ 那些案件中有將近三分之一涉及傳播與自焚相關的消息，被告人最高被判處13年刑期。⁷² 那些曾經與藏區同仁保持密切聯繫的流亡海外的僧人和活動人士報告說，到2016年初，從藏區獲得資訊已經變得更加困難和危險，因此在有些情況下他們只能停止與國內的人聯繫。⁷³

一位著名喇嘛在獄中去世，據報導安全部隊開槍驅散了大約一千名集會悼念他的群眾。

6. 動用武力鎮壓，傷亡時有發生：在藏區的安全部隊經常使用武力手段來鎮壓和處罰那些他們認為的政治異議行為，這包括一些出自宗教信仰的非暴力行為。2012年以來，有很多藏人由於擁有或分享達賴喇嘛的圖片、呼籲達賴喇嘛返回西藏，或是製作和傳播其他被查禁的有關宗教或宗教壓迫的資訊，遭到拘押或被判入獄。⁷⁴ 曾經遭受拘捕的人不斷提供有關酷刑的記錄，例如毆打、電擊棒電擊、被迫長時間保持一個難受的姿勢等等。⁷⁵ 這些虐待，再加上得不到醫療照顧，據報每年都有若干西藏良心犯在拘押期間喪生，這其中包括一些宗教領袖。⁷⁶

除了發生在警察局、違法設立的拘留中心和監獄的虐待事件，據瞭解安全部隊會向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有時甚至是在宗教慶典期間，而涉事軍警幾乎沒有受到任何處罰。在2015年7月一個著名的案件中，著名喇嘛旦增德勒仁波切在獄中去世，⁷⁷ 據報導安全部隊開槍驅散了大約一千名集會悼念他的群眾，至少有15人因槍傷被送往醫院。⁷⁸

經濟獎懲：胡蘿蔔、大棒和旅遊開發

隨著中國中產階級的興起、日益便利的交通條件和漢人對藏傳佛教日趨濃厚的興趣，在過去十年，藏區國內外遊客的人數一直在增加。可預期地，西藏高原各地的官員都試圖利用這個生財之道。由於西藏自治區增加了旅行限制，包括時常禁止遊客進入，自治區周邊各省的藏區獲得了遊客們的廣泛青睞。

在雲南省迪慶州，地方官員與藏傳佛教領袖建立起實質的關係並且為修葺重要寺院提供資金。雙方在迪慶州的主要城市被更名為香格里拉——一個虛構的人間天堂——之後，都從旅遊業的急速發展中獲得了利益。據報導，這些經濟收入使得寺院可以資助年輕的僧人去其他宗教機構深造。一般信眾也從以旅遊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中看到了利益，旅遊業提供了私營部門的工作機會，不像政府工作人員那樣受到各種宗教禁令的約束。根據學者本·希爾曼（Ben Hillman）的研究，這種富有成效的合作，某種程度上是由於迪慶州採取了“中國藏區最為開放的方式對待藏傳佛教”。⁷⁹

在其他一些藏傳佛教地點，旅遊業據稱則對宗教自由產生了較為不利的影響。例如，拉蔔楞寺的僧人們就抱怨，越來越多的中國遊客造訪干擾了他們日常的宗教活動。⁸⁰ 在西藏自治區，一位國外觀察者則關注到，在一座寺院內部和周圍原本住著一些藏人朝聖者的地方，現在已經由一些針對中國遊客的停車場和紀念品販售亭取而代之。⁸¹

中國當局還分別採取各種不同的“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來促使藏人順從政府各項指令和舉報他們的同胞。政府提供最高20萬元（3.15萬美元）的現金，獎勵提供與自焚事件或其他抗議行為僧人相關資訊的舉報人。“頑固不化”的寺院所獲得的政府資助會轉而流向那些政治上更加忠誠的寺院，或是世俗的社會服務提供者，抑或是新的基礎建設專案。⁸²

政府提供最高20萬元（3.15萬美元）的現金，獎勵提供與抗議行為僧人相關資訊的舉報人。

近些年來，地方政府一直威脅要從那些不遵從有關宗教規定或禁令的家庭或村莊撤走政府補助。⁸³ 有些家庭或村莊因為參與了政治或宗教的抗議行動而被禁止採集冬蟲夏草——這種每年只有幾周可以採集的藥草是很多藏人的一項可觀的收入來源。⁸⁴

社會反響與抗爭

中國政府對藏傳佛教施加控制的多重手段，已經在西藏高原各地的僧俗民眾當中造成明顯不滿的情緒。值得注意的是，造成反感或引發騷亂的官方行為不只是政府過度使用武力而已，還包括對平常生活的無處不在的管控，比如旅行禁令、禁止私下敬拜達賴喇嘛、在寺院裡的政治宣傳等等。⁸⁵ 這些管控措施對眾多參與或未曾參與某種政治抗議的僧眾都造成了影響。

這些干涉，加上官方慣常以施恩者自居的腔調，在藏人當中造成了強烈不滿情緒——他們認為政府不尊重和故意褻瀆他們宗教信仰。日益增多的官方使用極端暴力的案例進一步說明中國官員和安全部隊對藏人的生命缺乏尊重，2014年流亡海外的僧人和酷刑倖存者果洛久美（Golog Jigme，拉卜楞寺僧人）在最近一次的採訪中即表達了這種感受，他說“政府覺得我們藏人還不如動物，他們不把我們當人看。”⁸⁶ 學術性的研究和藏人抗議者的記述都一再指出，是這些因素導致了那些抗議行為，而不是流亡的運動人士或是達賴喇嘛的鼓動。然而，中國政府卻一直聲稱藏人的抗議行為是受到“敵對勢力”的影響以及“達賴集團”的煽動。⁸⁷

由於施加在那些公開挑戰官方政策人士身上的嚴厲懲罰，以及通過政治化的司法體系尋求正義的前景渺茫，大多數藏人用四種方式來回應限制性的宗教政策——逃亡境外、⁸⁸ 合作、迴避和“陽奉陰違”。

- **逃亡境外：**在2008年以前，每年有數千藏人逃亡。那些成功出逃的僧人和宗教領袖在接受採訪時解釋說，他們的動機是想要接受良好的寺院教育，這在藏區尤其是西藏自治區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甚至是不可能。⁸⁹ 隨著西藏高原各地越來越多的警方檢查站和尼泊爾邊界的軍力增強，逃亡這一選項已經基本被堵死，不過每年還是有很少一批難民出逃。
- **合作：**有很大一批藏傳佛教領袖與中國當局積極合作，還有一些人尋求與地方官員進行洽商，從而在與他們對信眾的責任和服從官方指令之間求得平衡，以圖將官方的鎮壓行動降到最低程度。⁹⁰ 積極合作的最突出的事例是現年26歲由政府認定的班禪喇嘛確吉傑布。他在各種政府主辦的會議上發言，還在一些特殊場合對信眾進行教導，並在2010年年僅二十歲時，成為最年輕的全國政協委員。官方媒體和統戰部網站上刊登的文章中，經常特意發表其他一些僧人、住持和官方認可的活佛們的照片和言論，指出他們執行黨的路線並感謝政府對藏傳佛教的支持。⁹¹ 很多藏人對這些人持懷疑態度，而其他一些在當地社群德高望重

的宗教領袖則試圖與地方官員建立起一種合作性的關係，以此來緩解衝突和抵禦迫害，這些努力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⁹²

- 迴避：當政府在他們的寺院裡進行“愛國主義再教育”運動時，迴避策略在僧侶們當中尤為普遍。根據來自西藏自治區以外的一座寺院的流亡僧人說，2012年官員們來寺院舉辦一系列學習班，儘管一再被要求參加，很多僧人還是不出席。他表示，由於官員們擔心在寺院裡引起抗議，寧可不強迫僧人們參加——這座寺院因曾經發生抗爭而聞名，而類似的騷亂對官員們自己也會產生不良影響。⁹³

被迫參加“愛國主義再教育”學習班的那些僧人們，很多人儘量修飾他們的發言，只承認官方宣傳中要求背誦的某些部分，諸如尊重官方的宗教政策等等，而避免發表更加敏感，像譴責達賴喇嘛之類的意見。⁹⁴ 在另一些情況下，據瞭解一些僧尼在“愛國主義再教育”運動或是其他官方檢查期間——例如確認寺院裡有無18歲以下的僧人或者是否所有人都有獲得在寺院學習的官方許可——會暫時逃出他們的寺院，躲避在當地社群或是在周邊的山裡。⁹⁵

- “陽奉陰違”：藏人民眾當中私下的抗爭行動幾乎和他們力圖破壞的官方管控措施同樣的廣泛和多樣。這些抗爭出現在中國政府無法觸及的私人和精神信仰範圍。很多僧侶和一般信眾秘密保有達賴喇嘛的畫像或檢查者無法當下察覺的其他代表這位精神領袖的物品。這些物品或是藏在盒子裡、在照片框背後、存在電子設備裡，或是在毯子下面。有些地方官員或是同情藏人、或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這些地區僅僅禁止公開張貼畫像。⁹⁶ 很多藏人還在家中私下教育他們的孩子有關達賴喇嘛的事蹟或是其他他們或許無法透過一般管道接觸的藏傳佛教的教義原則。⁹⁷

2010年以來，在中國境內外的藏人慶祝拉嘎節（Lhakar，藏語意為“白色星期三”）成為一種日益增長的趨勢。雖說該運動主要聚焦於展示文化認同（例如說藏語、穿戴藏裝），但由於民族認同與宗教認同之間的密切關聯，其因而有強烈的宗教意涵。⁹⁸ 相對於其他人，越來越多的藏人會選擇在這一天去寺院進行供養，或是在家中和當地宗教場所懸掛經幡。⁹⁹ 類似地，在禁止展示某些宗教象徵的背景下，一些藏人會悄悄地佩戴“和平護身符”，代表他們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決心遵從“佛教十善德”和不對藏人同胞暴力相向。他們通過這種間接的和非對抗性的方式，來表明自己的宗教價值觀和致力於藏人團結的決心。¹⁰⁰

藏人民眾當中私下的抗爭行動幾乎和他們力圖破壞的官方管控措施同樣的廣泛和多樣。

儘管冒著監禁、酷刑和死亡的危險，每年依然有許多藏人僧俗民眾以積極的和政治性的抗議方式反對政府對宗教的打壓政策。¹⁰¹ 這些抗議幾乎都是非暴力的。類似2008年拉薩自發性的騷亂事件和2013年在那曲比如縣發生的與安全部隊的衝突，依然時有爆發，但是相對而言，已經少有發生。

自焚：近年來在藏區發生的最為激烈、極端和有爭議的抗議形式，是自2011年以來發生的一系列超過140起自焚抗議事件。¹⁰² 儘管最初的一些案例主要涉及僧尼，但是有越來越多的信眾採取這一行動，到2016年中期，自焚者中的信眾人數已經超過了僧侶。從地理位置上看，絕大多數有記錄的自焚事件（大約95%）發生在西藏自治區以外，其中以四川省發生數量最多。這種差異或許反映了西藏自治區對抗議運動和資訊更加嚴格的管控，以及在2010年之前相對自由的地區，對打壓政策更加強烈的反應。

雖說各項不同的官方政策都似乎激發了自焚抗議的發生，至少有些帶有宗教色彩的部分，從抗議者呼喊的口號中可以看出這一點，這些口號包括“願達賴喇嘛長久駐世”、要求允許達賴喇嘛返回西藏、或是要求釋放最初由達賴喇嘛認定的班禪喇嘛等等。但是，一些對藏區問題有深

入瞭解的觀察者認為，自焚抗議事件的增加大體上可以解讀為生活在中國統治下的藏人絕望情緒的一個信號，尤其當逃亡境外變得愈加困難的時候。儘管如此，這種抗議方式——以及達賴喇嘛沒有對其積極加以指責——明顯地在佛教信徒和西藏學者們中間引起了爭議，有些人把自焚者看作殉道者，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即便是在極端情況下，自殺行為也不應該被寬恕或美化。¹⁰³

公開抗議：隨著當局將對自焚事件的懲罰擴展到自焚者的朋友、家人和甚至整個村莊，採取這種抗議形式的人數似乎在減少，在2016年上半年僅發生了兩起有記錄的自焚事件。取而代之的，發生在集市或其他公共場所的單人抗議事件變得引人注目。這樣的示威活動通常只有一名僧尼或是信徒手持達賴喇嘛的照片或是代表西藏獨立的圖片，比如西藏國旗，走過街市。安全部隊通常會立即撲向抗議者並拘押他們。違犯官方禁令的較大規模的集會也依然偶有報導。

得失勝負誰評說

雖然面對種種困難和愈加嚴厲的打壓，上文所描述的各種抗爭依然取得了某些成功。最為顯著的是在中國境內藏區對達賴喇嘛虔信的韌性，儘管他已經流亡印度超過50年，儘管中國政府想方設法對他進行妖魔化、否定他的宗教權威和強迫信徒們譴責他。

事實上，這種韌性最強有力的證據來自中國政府自己的言論和旨在鎮壓所有對達賴喇嘛虔信跡象的各種運動。例如，來自中央統戰部的一位高官認為，除了各種其他理由，政府支持的新建西藏佛學院在“抵禦達賴集團利用宗教進行滲透”方面也是非常必要。¹⁰⁴再者，如果僧俗信眾沒人參加為達賴喇嘛進行的祈禱活動，或是沒人在公共場所展示達賴喇嘛的畫像，青海省有關當局就不會在2015年頒佈的規定中，特別加入具體條款來禁止類似活動和重申有關懲罰。¹⁰⁵

至於其他的抗爭行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如何定義“成功”。對於個人示威者甚或是自焚者而言，只要能夠進行抗議並有他人在警方採取行動前目睹其抗議行為，就意味著一種勝利。逃離警方拘押並流亡境外的僧人果洛久美解釋說，他成功抵達印度就是一個勝利，但是他被迫離開不願意離開的故土，則是一個損失。他的案件得到國際關注，他說他兩次提早獲釋和最終沒有被判入獄得益於國際社會為此施加的壓力。¹⁰⁶

對於採取更加合作的態度與中國當局磋商的藏人宗教領袖們而言，哪怕是獲得小小的讓步或是得到某些宗教活動的許可也是勝利。不過，想要減少與政府當局之間分歧的努力並非總能如願以償。2014年在那曲比如縣，安全部隊在一座神山附近發生的衝突中，向民眾開槍，事後寺院領袖支付了受傷民眾的醫療費用，然而當局最後依然在這年年底關閉了這座寺院。最近，在喇榮佛學院，儘管人們認為學院的領導人們與地方官員保持著良好關係，但是大規模的強拆行為在2016年從未停止。¹⁰⁷ 這些挫敗從長遠而言，將使得避免衝突變得更加困難，因為這表明妥協與調和得不到任何回報。

未來展望

西藏的政治和宗教權威長期以來明確而又複雜的相互關係，在中國的主要宗教中獨一無二。這已經給中共的政策帶來特別的挑戰——官員們試圖在某些程度上允許一些宗教活動，而同時要強力鎮壓任何被認為具有政治顛覆性的行為。一直以來各種限制性措施都在強調後者的優先地位，不斷地侵蝕破壞日常和平的宗教活動，並在越來越多的僧俗信眾當中激起怨恨。

達賴喇嘛在2011年就已經將所有手中所剩的政治權威移交給西藏流亡政府的司政，但是中國政府依然把他看做一個政治威脅，而不純粹是一個宗教人物。事實上，中共寄望在十四世達

中國境內藏區對達賴喇嘛虔信的韌性，最強有力的證據來自中國政府自己的言論和旨在鎮壓所有對達賴喇嘛虔信跡象的各種運動。

“如果習近平有時間 好好梳理對藏政策，停 止攻擊達賴喇嘛，有百 分之五六十的問題能夠 因而得到解決。”

— 學者羅伯特·巴內特

賴喇嘛圓寂之後，集中力量控制他的轉世。政府已經宣稱，下一世達賴喇嘛將出生在西藏境內。

由於藏人對達賴喇嘛虔信的韌性，以及不願意真正接受政府支持的班禪喇嘛，政府的聲明似乎註定造成更多衝突。反之，如果中共領導人能決定採取更為調和的措施並接受達賴喇嘛作為宗教人物的作用，他們或許會因為社會緊張程度的降低而收穫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利益。有關西藏問題的著名學者羅伯特·巴內特（Robert Barnett）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認為，“如果習近平有時間好好梳理對藏政策，停止攻擊達賴喇嘛，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問題能夠因而得到解決。”¹⁰⁸

註解

1. 《民怨沸騰導致藏區反抗》（Simmering Resentments Led to Tibetan Backlash），Jim Yardley，《紐約時報》，2008年3月18日，<http://www.nytimes.com/2008/03/18/world/asia/18china.html>；《張慶黎做客新華網：共產黨才是老百姓真正的活菩薩》，新華網，2007年3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7-03/02/content_5792651.htm
2. 本文作者在2016年8月進行的採訪。
3. 基於藏區案件的分析列舉在美國國會中國問題委員會的政治犯資料庫中，這些分析來自於人權團體的報告和新聞媒體報導。見美國國會中國問題委員會，《政治犯資料庫》，（2016年11月30日瀏覽）<http://www.cecc.gov/resources/political-prisoner-database>。
4. 《冷酷無情：中國“維穩”運動中藏人遭遇拘禁和迫害》，人權觀察，2016年5月22日，<https://www.hrw.org/report/2016/05/22/relentless/detention-and-prosecution-tibetans-under-chinas-stability-maintenance>。
5. 對一位希望保持匿名的境外藏人研究者的採訪，2016年7月。
6. 《信仰佛教人數眾多，全國佛教僧侶22萬居五大教之首》，中國民族宗教網，2014年4月3日，<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14041545-1.htm>。
7. 《西藏僧尼享受更多福利》，巴丹尼瑪和達瓊在拉薩報導，《中國日報》，2014年1月7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4-01/17/content_17242870.htm；《民族區域自治在西藏的成功實踐》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年9月6日，http://www.scio.gov.cn/zfbps/dfwtbbs/Document/1447090/1447090_4.htm。
8. 《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國務院全國人口普查辦公室，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年，<http://www.stats.gov.cn/tjsj/rkpc/6rp/indexch.htm>。
9. 《一中多藏：迪慶是“有西藏特色”的發展模式？》，Ben Hillman，《亞洲民族》雜誌（Asian Ethnicity）11, no. 2（June 1, 2010）：269–77。
10. 在四川的一個村子對尼瑪拉姆（Nyima Lhamo）的採訪，2016年8月。
11. 《一中多藏》，Hillman；對Julia Famularo的採訪，2016年8月。
12. 例如，在2005年至2010年擔任西藏自治區書記的張慶黎，就被認為是一名強硬路線領導；國家媒體曾引用他嚴詞誹謗達賴喇嘛的言論，他親自督導強化了“愛國主義再教育”運動。相反地，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在1980年代擔任自治區書記的伍精華則領導了一段宗教復興和重建的階段。當時在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領導下，全國有一種政治自由化的氛圍。
13. 《中國拉攏一個佛教派別在全球詆毀達賴喇嘛》（China Co-opts a Buddhist Sect in Global Effort to Smear the Dalai Lama），David Lague, Paul Mooney, and Benjamin Kang Lim, 路透社，<http://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china-dalailama/>；《共產黨才是活菩薩：中國統治下西藏宗教的危機》，國際聲援西藏運動，2007，http://savetibet.de/fileadmin/user_upload/content/berichte/2007ReligionReport.pdf。
14. 《達賴喇嘛說，中國人對西藏問題的理解在加深》（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Tibetan issue is growing says the Dalai Lama），達賴喇嘛辦公室，2012年1月3日<http://www.dalailama.com/news/post/783-chinese-understanding-of-tibetan-issue-is-growing-says-the-dalai-lama>。
15. 《當今漢族與藏傳佛教：一個來自南京的案例》（Contemporary Han Chinese Involvement in Tibetan Buddhism: A Case Study from Nanjing），Alison Denton Jones，Sage Publishing, June 1, 2014, <http://scp.sagepub.com/content/58/4/540.short>；《藏傳佛教與漢族：更強大的現代中國給西藏傳統添加新意涵》（Tibetan Buddhism and Han Chinese: Superscribing New Meaning on the Tibetan Tradition in Modern Greater China），Joshua Paul Esler, http://research-repository.uwa.edu.au/files/4389752/Esler_Joshua_2013.pdf。
16. 採訪哥倫比亞大學現代西藏研究學程主任羅伯特·巴內特（Robert Barnett），2016年7月。
17. 採訪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研究人員，2016年4月。
18. 採訪約翰·鮑爾斯（John Powers），2016年8月；見索達傑堪布的新浪微博，在2016年11月10日，該微博有2,151,223名粉絲。<http://www.weibo.com/suodj>。
19. 形勢自1950年代中期以後變得越發危急。藏人對中共的疑慮開始增加，在西藏東部地區爆發了一場大規模反叛。在拉薩的藏人認為達賴喇嘛的權威正在逐漸遭到侵蝕，這更增加了不滿情緒。隨著東部藏區戰鬥的加劇，藏人中的反中情緒也在增加，促使對達賴喇嘛的人身安全產生廣泛擔憂。

20. 《雪域境外流亡記》，約翰·艾夫唐（John Avedon），（New York: Vintage, 2015），72。
21. 《龍在雪域》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 羅伯特·巴內特（Robert Barnett），《限制與異動：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與對藏管制》（Restrictions and Their Anomalies: The Third Forum and the Regulation of Religion in Tibet），《當代中國事務雜誌》（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41, no. 4 (February 1, 2013), 45–107。
23. 同上。
24. 《共產黨才是活菩薩：中國統治下的西藏宗教危機》，國際聲援西藏運動，2007。
25. 人權觀察，《中國禁區：媒體封鎖西藏和其他“敏感”話題》，July 6, 2008, <https://www.hrw.org/report/2008/07/06/chinas-forbidden-zones/shutting-media-out-tibet-and-other-sensitive-stories>。
26. 約翰·鮑爾斯（John Powers），《黨即是佛：中國如何界定和控制藏傳佛教》（The Buddha Party: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orks to Define and Control Tibetan Buddhism），（New York C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7. 《兒童在拉薩騷亂的火災中被燒死》，中國日報，2008年3月24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8-03/24/content_6559963.htm。
28. 國際聲援西藏運動，《轉捩點上的西藏：春季的起義與中國新鎮壓》，2008年8月6日，https://www.savetibet.org/wp-content/uploads/2013/03/Tibet_at_a_Turning_Point.pdf。
29. 同上。
30. 《黨即是佛》，約翰·鮑爾斯（John Powers）。
31. 2016年8月對一名2014年抵達印度的西藏僧人的採訪，他是一名酷刑倖存者；2016年8月對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文化歷史和語言學院教授約翰·鮑爾斯的採訪。
32. 自2009年以來，在西藏自治區和周邊省份已經確認有144起自焚抗議：2011年12起，2012年86起，2013年27起，2014年11起，2015年7起，2016年截至3月發生一起。國際聲援西藏運動，《自焚抗議地圖：2009-2016》，2016年3月2日，<https://www.savetibet.org/resources/fact-sheets/self-immolations-by-tibetans/map-tibetan-self-immolations-from-2009-2013/>。
33. 很多自焚者的言論和遺言也顯示，抗議的主要聽眾對象是他們的藏人同胞，很多自焚者強調藏人要團結要通過減少藏人之間的暴力衝突、說藏語、給孩子們傳授藏人的文化傳統來抵制中國政府的政策。對約翰·鮑爾斯的採訪。羅伯特·巴內特（Robert Barnett），《西藏的政治性自焚：原因與影響》（Political Self-Immolation in Tibet: Causes and Influences），Revue d' Etudes Tibetaines 25 (2012), 41–64, http://himalaya.socanth.cam.ac.uk/collections/journals/ret/pdf/ret_25_03.pdf。
34. 自焚事件最多的月份據報導是2012年11月。《藏人為何自焚？》，茨仁唯色（Tsering Wooser），《紐約時報書評》，2016年1月11日，<http://www.nybooks.com/daily/2016/01/11/why-are-tibetans-self-immolating/>。
35. 國會中國問題委員會，《2013年度報告》，October 10, 2013, <https://www.cecc.gov/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3-annual-report>；國際聲援西藏運動，《來自中國內部對西藏政策的新挑戰》，2013年6月27日 <https://www.savetibet.org/new-challenges-to-tibet-policy-from-inside-china/>。
36. 《中國前任國家主席的助手令計畫被捕》，查理斯·克洛佛（Charles Clover），金融時報，2015年7月20日，<http://www.ft.com/cms/s/0/a1e33ca6-2f4f-11e5-8873-775ba7c2ea3d.html#axzz4HhwJYdrl>。
37. 對羅伯特·巴內特的採訪，2016年7月
38. 《西藏白皮書：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全文）》，2015年4月1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4/15/c_1114974653.htm
39. 《日印特殊夥伴關係與中國》，蘇巴什·迦毗羅（Subhash Kapila），南亞分析，November 13, 2016, <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china>。
40. 《西藏：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團結，習近平說》，Claude Arpi, August 26, 2015, <http://claudearpi.blogspot.com/2015/08/tibet-cherish-unity-with-china-as-if-it.html>。
41. 《“荒誕而可怕”的新規則把矛頭指向家人、村民和寺院，加快對自焚事件判罪》，國際聲援西藏運動，2014年2月24日，<http://www.savetibet.org/absurd-and-terrifying-new-regulations-escalate-drive-to-criminalize-self-immolations-by-targeting-family-villagers-monasteries>。
42. 《煽動自焚者必將受到法律嚴懲》，《甘南日報》，2012年3月12日，<http://gn.gansudaily.com.cn/system/2012/12/03/013508017.shtml>。
43. 《當局向西藏比如縣藏人運動施加進一步限制》，Tibet Post International, 2014年7月13日，<http://thetibetpost.com/en/news/tibet/4150-further-restriction-imposed-on-tibetans-movement-in-driru-tibet>。
44. 《中國在達賴喇嘛生日前夕禁止藏區群眾集會》，Richard Finney 等，自由亞洲電臺，2015年6月10日，<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blocks-06102015160216.html>。
45. 對一位西藏僧人的採訪；《“受不了的”西藏寺院：寺院在1950年代以來的西藏抵抗運動中的作用》，西藏觀察，2016年4月，http://www.tibetwatch.org/uploads/2/4/3/4/24348968/tibets_intolerable_monasteries.pdf。
46. 《限制與異動》（Restrictions and Their Anomalies），羅伯特·巴內特（Robert Barnett）；《西藏的動盪與區域自治的局限》（Unrest in Tibet and the Limits of Regional Autonomy），本·希爾曼（Ben Hillman）。見Ben Hillman 和 Gray Tuttle編輯的《西藏和新疆的民族衝突與反抗》（Ethnic Conflict and Protest in Tibet and Xinjiang），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18–39。

47. 部分英文翻譯見《中共西藏書記在南茜佩洛西訪問拉薩時，談在反達賴喇嘛的鬥爭中劃“紅線”》，國際聲援西藏運動，2015年11月13日，<https://www.savetibet.org/tibet-party-boss-speaks-of-establishing-red-lines-in-the-anti-dalai-lama-struggle-as-nancy-pelosi-visits-lhasa/>；《共產黨警告那些暗中追隨達賴喇嘛的各級幹部》，Edward Wong, 《紐約時報》，2015年11月11日，<http://www.nytimes.com/2015/11/12/world/asia/communist-party-in-tibet-aims-to-punish-dalai-lama-followers.html>.
48. 《為達賴喇嘛祈禱和點酥油燈是“非法的”：熱貢地區的新規定》，國際聲援西藏運動，2015年4月14日，<https://www.savetibet.org/praying-and-lighting-butter-lamps-for-dalai-lama-illegal-new-regulations-in-rebkong>.
49. 2016年7月，對Robert Barnett的採訪。
50. “西藏佛學院首批學員畢業 被授予自設學銜”，中共中央統戰部，2013年7月16日，<http://www.zytzb.gov.cn/tzb2010/S1831/201307/741370.shtml>,
51. 2016年7月，對Robert Barnett的採訪；《中國：佛教寺院面臨強拆》，人權觀察，2016年6月9日，<https://www.hrw.org/news/2016/06/09/china-buddhist-monastery-faces-demolition>.
52. 《非暴力：西藏高原上的移動信標》（Non-violence as a shifting signifier on the Tibetan plateau），Holly Gayley and Padma ‘tsho, 《當代佛教》（Contemporary Buddhism）(2016), 1-19,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4639947.2016.1189155>; 中國國家宗教事務管理局, 《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2007年8月2日，<http://www.sara.gov.cn/zcfg/bmgz/571.htm>.
53. Hillman, 《西藏的動盪》（Unrest in Tibet）。
54. 對Julia Famularo的採訪，2016年8月。
55. Hillman, 《西藏的動盪》（Unrest in Tibet）；對Robert Barnett的採訪，2016年7月。
56. 對一名西藏僧人的採訪，2016年8月。
57. 《廣場上的宣傳：在中國西部向維吾爾人和藏人傳達政府有關宗教和民族的指示》（Propaganda in the Public Square: Communicating State Directives on Religion and Ethnicity to Uyghurs and Tibetans in Western China），Antonio Terrone. 見Ben Hillman 和 Gray Tuttle編輯的《西藏和新疆的民族衝突與反抗》（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40-59。
58. 國家宗教事務局, 《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
59. 《“受不了的”西藏寺院：寺院在1950年代以來的西藏抵抗運動中的作用》。
60. 很多這些管控措施都是基於2007年頒佈的《宗教事務條例》實施辦法，在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出版的《共產黨才是活菩薩》一書中有記載和英文翻譯，見第89頁。
61. 在西藏自治區，這種管控要求一個新的官方委員會來管理日常運作和強化宣教運動。在自治區以外，原有的民主管理委員會系統得以保留，只是加入了一名政府官員作為副主任，當然會有些例外。在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據報導，當局下令在2014年6月之前所有寺院必須由幹部或黨指派的人員替代原來所有的工作人員和管委會成員。
62. 美國國務院《2015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中國部分（含西藏、香港和澳門），本文資料獲取於2016年11月30日，http://www.state.gov/j/drl/rls/irf/religiousfreedom/index.htm?dynamic_load_id=256099&year=2015#wrapper.
63. 《達賴喇嘛對信眾們說，“譴責我吧”》，World Tibet Network News, Canada Tibet Committee, 1999年2月8日，http://www.tibet.ca/en/library/wtn/archive/old?y=1999&m=2&p=8_3.
64. 2016年8月對約翰·鮑爾斯（John Powers）的採訪；《中國：監控西藏無止期》，人權觀察，2016年1月18日，<https://www.hrw.org/news/2016/01/18/china-no-end-tibet-surveillance-program>.
65. 《共產黨才是活菩薩：中國統治下西藏宗教的危機》，國際聲援西藏運動。
66. 《中國對藏人和其他人的國際旅行限制》，人權觀察，2015年7月13日，<https://www.hrw.org/report/2015/07/13/one-passport-two-systems/chinas-restrictions-foreign-travel-tibetans-and-others>.
67. 《共產黨警告那些暗中追隨達賴喇嘛的各級幹部》，Edward Wong, 《紐約時報》，2015年11月11日，<http://www.nytimes.com/2015/11/12/world/asia/communist-party-in-tibet-aims-to-punish-dalai-lama-followers.html>；《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是立黨之本》，張磊, 《中國紀檢監察報》，2015年11月9日，http://csr.mos.gov.cn/content/2015-11/09/content_19075.htm.
68. 《西藏的動盪》，Ben Hillman,
69. 對John Powers的採訪，2016年8月。
70. 《婦女駭人吊死震驚藏區，員警禁言所有質疑》，Simon Denyer, 《華盛頓郵報》，2016年8月26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a-young-womans-death-in-tibet-provokes-anger-and-a-brutal-crackdown/2016/08/25/239b628a-63bd-11e6-b4d8-33e931b5a26d_story.html.
71. 《冷酷無情》（Relentless），人權觀察。
72. 來自西藏自治區那曲州比如縣的茨城堅贊（Tsultrim Gyaltzen）和宇傑（Yulgyal）在2013年10月，分別被判處13年和10年徒刑，罪名是“從事分裂活動和散佈（與抗議活動有關的）謠言破壞社會安定。”
73. 《“受不了的”西藏寺院》，西藏觀察。
74. 《因達賴喇嘛照片被判入獄18年》，自由西藏，2014年4月1日，<https://freetibet.org/news-media/na/18-years-prison-dalai-lama-picture>.
75. 僧人南傑慈成（Namgyal Tseltrim）2013年5月11日從拉薩的一所監獄被釋放，此前他被關押了將近8個月，沒有正式逮捕、控罪或判決。在被關押期間，他遭到酷刑導致右手失去功能。根據當地的一位藏人透露，當局在南傑慈成寺院裡的住處

- 發現了達賴喇嘛的照片，以及達賴喇嘛講經說法的DVD。當局隨後指控南傑慈成犯有“分裂國家”罪。見《無人追究的酷刑：2008至2014年的29例西藏政治犯》，國際聲援西藏運動，2015年2月26日，<https://www.savetibet.org/newsroom/torture-and-impunity-29-cases-of-tibetan-political-prisoners/#tortured>。
76. 《西藏宗教領袖仁增德勒仁波切在獄中去世》，Patrick Boehler, 紐約時報, 2015年7月13日, http://www.nytimes.com/2015/07/14/world/asia/tenzin-delek-rinpoche-tibetan-religious-leader-dies-in-chinese-custody.html?_r=0。
 77. 同上。
 78. 《照片披露藏人遭中方槍擊慘狀》，藏人行政中央, 2015年7月15日, <http://tibet.net/2015/07/grievous-photos-emerge-of-tibetans-injured-in-chinese-firing/>; 《無人追究的酷刑：2008至2014年的29例西藏政治犯》，國際聲援西藏運動; 《比如縣實施新的嚴厲“整治”措施：尼師遭到驅逐並威脅要拆毀寺院和瑪尼牆》，國際聲援西藏運動, November 20, 2014, <https://www.savetibet.org/harsh-new-rectification-drive-in-driru-nuns-expelled-and-warning-of-destruction-of-monasteries-and-mani-walls/>。
 79. 另有一位觀察者注意到，這個地區也是一個漢化程度相當高的地方，一些藏人僧侶的漢語比藏語更熟練——這或許是寺院與官方關係比較少摩擦的一個原因或是結果。見《一中多藏》(China's Many Tibets), Hillman。
 80. 《“受不了的”西藏寺院》，西藏觀察。
 81. 對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研究者的採訪，2016年4月; 《共產黨才是活菩薩》，國際聲援西藏運動。
 82. 《“受不了的”西藏寺院》，西藏觀察。
 83.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了西藏自治區江達縣當局，命令居民叫回他們家人中在其他省份的佛教中心學習的僧尼，那些被發現違反命令的家庭被威脅取消所有形式的政府補助。見《西藏一個縣的僧尼在宗教鎮壓運動中被迫返鄉》，Kunsang Tenzin, Karma Dorjee 和 Richard Finney報導，自由亞洲電臺，2014年10月24日。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return-10242014162330.html>。
 84. 例如，在2014年9月，直接針對比如縣的抗議活動，比如縣人民政府下達嚴厲指令控制居民。列舉出的懲罰措施如下：“懸掛或私藏達賴畫像的普通群眾將強制接受為期6個月的法制教育，並剝奪收集冬蟲夏草的權利兩年。”《比如縣實施新的嚴厲“整治”措施：尼師遭到驅逐並威脅要拆毀寺院和瑪尼牆》，國際聲援西藏運動。
 85. 《廣場上的宣傳：在中國西部向維吾爾人和藏人傳達政府有關宗教和民族的指示》(Propaganda in the Public Square: Communicating State Directives on Religion and Ethnicity to Uyghurs and Tibetans in Western China), Terrone。
 86. 《“受不了的”西藏寺院》，西藏觀察。
 87. 《廣場上的宣傳》，Terrone。
 88. 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89. 《共產黨才是活菩薩》，國際聲援西藏運動
 90. 對一位西藏僧人的採訪。
 91. 《環球時報》報導：來自昌都一座寺院的Jizhong活佛說，“現在是藏傳佛教歷史上最好的時光。我們應該繼承和發展愛國愛教的傳統，為宗教適應社會主義社會做貢獻。另見環球網，“Training course for new Living Buddhas held.”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16253.shtml>
 92. 一些觀察人士一直把喇榮五明佛學院作為發展與地方官員積極關係的例證，但是這個事例在2016年當局發動強拆學院住所時似乎沒有什麼說服力。見《一中多藏》(China's Many Tibets), Hillman
 93. 對一位西藏僧人的採訪。
 94. 這種方法並非總能成功，因為官員們也採取了相應的變化並要求更加直接的斥責。見《共產黨才是活菩薩》，國際聲援西藏運動。
 95. 同上。
 96. 採訪茱莉婭·法莫拉羅 (Julia Famularo)，2016年8月。
 97. 採訪尼瑪拉姆。
 98. 與一位希望保持匿名的西藏研究者的電子郵件交流。亦見於《拉嘎星期三運動：西藏精神的慶典》，美國之音，2012年7月13日，<http://www.voatibetanenglish.com/a/1404065.html>。
 99. Tsedo, “Lahakat,” American Himalayan Foundation (blog), March 9, 2012, <http://www.himalayan-foundation.org/blog/114374>。
 100. 《非暴力：西藏高原上的移動信標》，Holly Gayley and Padma ‘tsho
 101.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抗議事件受到中國政府無關宗教的政策或行為引發，例如有關學校的教學語言或是損害當地環境的開發專案等等。由於本報告主旨為宗教，這些抗議因而沒有被考慮在內。
 102. 有一起自焚抗議發生在2009年，但是由於在時間上屬於獨立事件而沒有計算在內。
 103. 對羅伯特·巴內特和境外希望保持匿名的藏人學者的採訪，2016年7月。
 104. 朱維群，時任中共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和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主任。見美國國會中國問題委員會《2012年度報告》，2012年10月10日，<https://www.cecc.gov/publications/annual-reports/2012-annual-report>;
 105. 《中國發佈“有關西藏獨立的20項違法行為”》，Oliver Arnoldi, Tibet Post International, 2015年2月25日, <http://www.thetibetpost.com/en/news/tibet/4436-china-issues-20-illegal-activities-related-to-the-independence-of-tibet>。
 106. 西藏觀察，《果洛久美加錯訪談》，2014年7月, http://www.tibetwatch.org/uploads/2/4/3/4/24348968/an_interview_with_golog_jigme_gyatso.pdf。



自由之家是一個非營利、
無黨派機構，支持民主變
化，監督自由，倡導民主
和人權。

1850 M Street NW, 11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036

120 Wall Street, 26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5

www.freedomhouse.org
facebook.com/FreedomHouseDC
[@freedomHouseDC](https://twitter.com/freedomHouseDC)

202.296.5101 | info@freedomhouse.org